



UNRISD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EXECUTIVE SUMMARY

Gender Equality: Striving for Justice in an Unequal World

April 2005

CHINESE VERSION

Draft- do not cite without UNRISD approval



The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RISD)** is an autonomous agency engaging in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contemporary problems affecting development. Its work is guided by the conviction that,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policies to be formulate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is crucial. The Institute attempts to provide governments, development agencies,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scholars with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processe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affect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Working through an extensive network of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s, UNRISD aims to promote original research and strengthen research capac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urrent research programmes include: Civil Society and Social Movements; Democracy, Governance and Human Rights; Identities, Conflict and Cohesion; Soc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Business and Society.

A list of the Institute's free and priced publications can be obtained by contacting the Reference Centre.

UNRISD, Palais des Nations
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Tel: (41 22) 9173020

Fax: (41 22) 9170650

E-mail: info@unrisd.org

Web: <http://www.unrisd.org>

Copyright ©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RISD).

This is not a formal UNRISD publication. No publica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ummary is permitted without the prior UNRISD authorization, except for personal use.

男女平等：在不平的世界里争取公正

摘要

北京大会之后：不平等世界里的不平衡进展

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十年之后，全世界许多妇女组织要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过去的十年里取得了多少进展？然而，对于那些关注和要求实现男女平等的人们来说，答案难以找到，或模棱两可。

在过去的十年里，妇女无疑得到了明显的收获：更多的妇女在经选举产生的议会和国家机构中供职；性别差别在中小学招生方面有所减小（中学比小学差些）；大量妇女出现在劳动市场和出国的劳动人流中；以及较低的生育率。

妇女生活中的这些变化，与伴随经济发展出现的社会变革有关，但并不单纯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在很多情况下，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因国家改革和社会运动得到刺激或加速。国家与跨国的妇女运动在提高妇女权利方面，得益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政治形势的变化。一项显著的成绩，是将性和生育健康与生育权利，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以及性别关系方面的权力不平等事宜提到了全球性和全国性辩论的中心。

性别不平等继续存在

这些积极的结果，受到继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不利的经济与政治环境的限制。

从数字上来说，参加工作和参与政治的妇女人数是增加了，但被广义地定义为性别差别的缩小隐藏着显著的性别不对称和分割，限制了妇女的收入、权威和权力。在许多国家，生育率的下降继续改善着妇女在其生育年龄段的生活机遇，但在有些国家也出现了由于歧视妇女而造成的男性对于女性的高比例。在更为广泛的层面，妇女成就的矛盾特性反映在劳动力的“女性化”，即大多数国家妇女参加有酬劳动的机会增加的同时，许多人的工作地位和条件变差了。

对这些不同的结果，无法作出单一的解释。性别不平等在所有社会中根深蒂固，并通过许多习俗和制度再现，包括政策干预。本报告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在实现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的有利与不利条件方面，发展政策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不良的政策环境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上升至统治地位的新自由经济纲领，集中在紧缩财政，加强私有产权和利润驱动的市场方面，并呼吁国家减少干预。通货膨胀在许多国家得到控制的同时，物价平稳是以减少经济增长与就业机会为代价获得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多变更为频繁，收入的不平等在全球进一步扩大。

在缺乏足够的安全网情况下，经济自由化使低收入家庭处于维持生计的重压下。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低收入的妇女在过于人浮于事的城市正规经济中，更多地以户外从事经济活动者，农业临时工和移民身份出现。同时，福利事业，特别在流行世界的爱滋病毒携带与爱滋病（HIV/AIDS）方面，悄悄的商业化意味着更为贫困的家庭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调整，更多的关注家庭，让妇女和女孩肩负更多的责任。

继续影响世界许多地方的社会危机，以最引人注目的方式，表现在社会的不稳定与政治骚乱，包括内战的爆发与继续。其临时的动力孕育着潜在的经济与社会灾难。在这些不安全和充满暴力的区域，很少有人能逃逸战争带来的影响，不管他们是否作为参战人员积极参与。

将性别问题从新归入到政策纲领

本报告采用的分析方法认为，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经济与权力结构以及对阶级与种族区分作出的反应的相同方式，深深地刻有性别区分的烙印。性别上的不平等是所有社会的普遍特征，它们是社会建立的权力关系，法规和习俗的产物。

在人们对一些领域，特别是家庭间层面以及“传统”与“习惯”起着重要作用的法律领域，性别不平等现象日益关心的同时，人们对公共政策有关性别事宜给予的注意往往是有选择性的。由此引起的沉默与不作为正在显示：例如，市场与宏观经济流通（贸易，资本）并不总受性别分析的影响，含蓄的假定是它们本质上良好，在性别问题上中立。然而，本报告发现，这既不适用经济于又不适用于家庭；国家，社区，政治派别或“进步”的社会运动也不一定以中立立场运作。

本报告所作的分析主要针对广泛的体制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性别关系。但是主要的焦点是由阶级，种族，种族关系和世袭等级区分的妇女。鉴于发展官僚机构与一些学术研究机构近来在思想（和语言）方面的变化，重要的是继续突出妇女事宜。这些机构有时无意中忽略了妇女从属问题的持续重要性。这并不表示男子始终具有优势，即便过去在与妇女的关系方面是这样。男权主义文化对男子可以有反作用或破坏作用。男子是家庭和社会暴力的凶手，也是家庭以外的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强调妇女从属问题并不表示未变化的性别关系是静止不变的，相反，重要的是要承认随着旧形式的解体和重新建立，性别等级制度不停地变化着。

现行政策纲领及其对性别平等的影响

近年来，政治和政策环境为争取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社会政策和“良好治理”改革被置于发展政策纲领的重要位置这一事实，看来为解决性别在拥有资源和服务方面的不平等，以及国家在性别特定能力和责任感的失误方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进入点。

被称之为“华盛顿之后共识”的现有主要政策文件保留了经济正统性的一些核心内容，并得到有关民主“参与”和“社区拥有权”的“良好治理”纲领的补充。在由“贫困”与“社会保障”共同词汇构成的外在共识里，因基于不同的价值，不同优先考虑的事宜和对国家责任的不同理解而造成对社会政策的不同理解值得注意。同样，对“良好管理”纲领的广义理解会包括政治自由化和人权，会涉及作为对民主基本承诺部分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而批评者则认为，这种管理改革实际上由强加给体制改革的未作区别和抽象的蓝图主宰。这已趋向于排除性别平等。然而，有些管理改革，特别是把政治权力下放到地区政府和市政当局，似乎协调了妇女在地方一级的政治代表性，有可能对政策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地方一级的传统家族制度反对妇女参与地方权力机构的地方，这类积极成果则可能难以取得。

确实，近年来与特定势力同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个体特性政治”。它尤其以围绕种族关系，种族和宗教本身发动的运动的形式出现。有关性别平等以同一性为基础的断言和学说之间存在争议，不过它们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对于人权与妇女权力纲领的一些激烈的攻击来自宗教性的复活，包括维护“传统的”性别作用和权威体制。典型的，由其中的一些运动推行的“传统”和宗教教旨也许既非正统又非正宗，与此相反，近来被用来为政治服务。

在经济政策与性别平等之间建立联系

一个主导政策模式趋向加大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和加强边缘化的世界，一个没有从新分配的世界，一个政府牺牲其公民利益以接受全球势力的世界，不大可能是保证性别平等的世界。因此，女权积极分子日益将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在较大的全球势力结构上，放在与宏观经济趋势有关的，全球不公正问题的演化上。全球经济公正对于争取妇女性与生育健康和权利也十分重要。不过，使政策制订者敏捷地注意到全球经济公正与性别公正之间的互相依存性，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一旦完成了，则需要通过相当的努力，实现对性别敏感的政策的变化。

此外，经济公正和性别公正需要协定的全球政治环境，近年来不很有利。人权与妇女纲领，以及整个多边框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收获通过此框架获得）被由恐怖主义，激进主义，战争与单方行动主义引起的，当前的全球政治危机削弱。如果不想让性别公正事宜在纲领上被进一步遗忘的话，妇女运动需要与政府机构，社会运动和政治派别结成新的联盟。

第一节：宏观经济，福利和性别平等

自由化和非限制：通往性别平等的道路？

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广泛奉行新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的家庭非限制政策。他们相信,政府对经济最低程度的干预,更多地依靠以利润为目标和市场的自由运作,能更有效地分配经济资源,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普及发展,更迅速地增加收入,从而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推断的结果是,妇女将是同等的受益者,就业,收入和教育机会的增多则会导致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

然而,理性的分析与大量经验主义的证据,不足以为这样的前景提供足够的支持。这种政策态度没有为提高妇女福利,克服性别偏见,消除基本能力和机遇以及拥有资源方面的性别差别,提供一个支持环境;也未能让妇女与男子更为合理地分享有酬劳动,以及分担照顾家庭和抚养孩子所需要的费用。

当然,新的自由主义,即便按其自身的情况,一般是不成功的。严厉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一般已控制住通货膨胀,但这是以大多数地区(尤其是最贫困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减小,有限的结构改革,以及就业的低增长或负增长为代价的。国际资本流通的自由化,导致金融和经济更加多变,金融危机更频繁,更严重。许多国家的财政,因与贸易和财政有关的税收减少以及资本税率的下降,而紧缩。这些往往导致作为国民生产总值(GDP)为份额的政府费用的减少。在一些情况下,费用的削减集中在影响基础设施的基本费用上;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卫生,教育,福利和社会安全网的费用被削减。

此外,在许多国家,国内收入的不平衡未减小,贫困程度普遍增大。人力发展趋势,贫困与不平等指标,以及在国民生产总值的稳定增长或已提高的卫生和福利标准方面,对启动社会发展的新自由政策的能力提出质疑。

总之,预测的高经济增长和贫困的减少并未兑现,而恰恰在最需要有效的社会保障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能力被广泛削弱。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些奉行旨在管理市场(而不是完全使市场自由化),以谋求工业发展的政策的亚洲国家,在经济增长,发展和贫困减少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过,他们在提高妇女福利的一些方面,比走新自由道路的国家明显成功的同时,他们在性别平等方面,尚未取得显著的,全方位的进展。

自由化,劳动市场和妇女的利益:一幅混和的画面

在自由化影响下,竞争日益加强的世界经济环境里,一项无论在工业,农业或近年来在服务行业,一项将重点放在密集型劳动和以出口为主的发展战略,加强了企业在雇佣最廉价劳动力方面的努力。妇女较低的工资使她们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劳动力来源,其结果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妇女有酬雇佣的层面和份额均有增长。这种增长往往直接或间接与跨国企业有关。

然而,妇女福利和性别不平等因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自由化而得到改善的证据,显示出一幅混和的画面。确实,这种分析指出性别作用(与使妇女有酬劳动降至她们照料家庭之后次要位置的法规有关),工业造成的工作分割,以及高度竞争性国际环境中的企业的要求之间的巧合。

在一些情况下，出口部门正规职位的报酬和工作条件优于经济领域的其他部门。但是，许多工作是没有保障和没有出路的。家庭作业的妇女分承包工作同样没有保障和没有出路（如果不是更不安定），并且待遇很差。妇女就业所得并不总是永久性的，许多国家制造业部门有酬雇佣的妇女份额的减少就是证明。失去在国际易变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工作的妇女，难以在资本更为密集的制造工业得到就业机会，因为后者可能取代前者。此外，廉价进口产品的竞争性导致当地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减少。

而且，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和衰退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货收缩的倾向，对妇女产生的影响比对男子的更严重，例如妇女的失业程度往往高于男子。此外，在非正规经济中从事自我就业或计件工作的妇女人数多于男子。

大多数妇女面临的这些就业情况，从结构上来说，难以提高妇女的工资和缩小性别工作的差别。对于增长更快的亚洲经济的调查表明，在性别工资差别最大的那些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最为迅速。即使在一些经济增长最迅速的亚洲经济实体内，带有歧视性的工资差别部分在全球化时代也未减少。

鼓励资本自由流通的政策造成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于女工和男工有着不同的影响。在1997年的东亚危机中，妇女因其就业保障程度低和“男子养家”偏见的歧视，往往首先失去工作。

公共经费：妇女的生命线？

财政紧缩造成的对公共经费的限制，对妇女尤其具有负面影响。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方面的经费停滞或减少，尤其给妇女增加了沉重的负担。这是因为妇女主要负责家庭管理和无酬的照料工作。正常时候，家庭发挥代理安全网或最后的避难所的作用，妇女在有酬和无酬劳动之间倾注其时间和精力方面，则承担着最大的负担。遇到经济危机时，这种情况加剧。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这都会给妇女以及微观和宏观效益带来损害。

如果能使妇女进入劳动市场更广泛的部门的女性能力需要加强的话，那末更多的国家经费必须用在卫生和教育方面。较高的政府经费也需要用在亦覆盖妇女劳动力的社会保障机制方面。因经济的多变造成的就业无保障，日益灵活的劳动市场的高劳动周转率以及妇女在非正规工作方面的优势，对社会保障机制尤其有影响。总之，在公开与竞争的环境下，国家急需保护其所有公民（妇女和男子）免受变幻莫测的市场的影晌。

出于财政和其他原因而实行的公用事业私有化，也给妇女带来相当大的短期损失和可能的长期损失。政府推出用户费用并未为社会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从妇女的角度来说尤其如此。在低收入和必需的公共服务行业很少，以及免税计划在实际生活中又通常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妇女经常担负起管理家庭预算的责任。

维护妇女的利益：需要更为广泛的政策纲领

除了对妇女在福利方面的确切情况的趋势进行跟踪以外，必须对她们相对于男子的地位变化作出评估。这是因为性别的差别既影响又反映权力的活动，而它们本身在资源和能力分配的进程中，有可能发生积极的变化。重要的是要使用广泛的指标，而不仅仅是人均收入的货币度量，评估快速和缓慢增长的经济中，性别在福利方面的差别是否业已发生变化。

在性别差别有所缩小的同时，也有明显的例外甚至逆转，说明积极的变化不一定稳定或持久。同样，对差别的缩小也需要进行周密的调查，因为这可能反映出男性能力的减弱。然而，女性能力方面的积极趋势，并不总是自动地解释为妇女有更多的机会。例如，在缺少就业机会的缓慢增长的经济中，性别法规在保证男子比妇女有更多就业机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性别平等不大可能在妇女不参政的情况下取得。但仅仅是妇女进入立法机构，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有有利于妇女的经济政策。与广泛的民间社会代表磋商，通过减贫战略文件（PRSPs）制订发展战略时，引入从外表来看更具有参与性的方法，并不证明其是妇女参政的高度有效的手段。最为相关的缺点包括：与妇女团体低层次的磋商，经常性的缺乏将性别分析与对贫困的判断结合起来。一般来说，在宏观经济和发展政策分析中，或在减贫战略文件有关推荐的减贫战略，资源分配或监督与评估的章节中，性别尚未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

除了提高妇女能力和增加她们自己与家庭的机会，改善她们相对于男子的福利，以及提高她们在家庭和其他社会机构中的发言权之外，哪些宏观经济战略更适合于促进性别平等发展？原则上，只有在具备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稳定，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正在扩大的正规就业机会，从新分配的税收和公共费用，以及也涉及妇女的社会政策时，才能合情合理的期望这些改善很有可能取得。

提倡男女平等的经济学家与异端经济学家一起，确定那些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范围更广泛的政策工具，能使他们提供因地制宜调整政策的空间和余地的，辅助宏观经济政策文件的组成部分和相关政策。但是，他们意识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改变尽管是必需的，但却依然是不够的。

宏观经济政策对于性别平等的促进程度不仅仅取决于它们提高经济增长的能力。经济增长对于男子与妇女有着不同的影响，这是由于经济增长是通过各种型式的市场，家庭间和户间的资源分配，以及公共费用运作的。这些都受到有关妇女作用和权利的社会法规的普遍影响。于是，妇女和男子的能力，他们拥有的诸如时间，土地，信贷和收入等资源，以及他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5_21325

